

互聯網在西北農村的 兩種應用模式

• 王錫苓、李惠民、段京肅

一 前言

由於中國城市、農村二元結構的對立，城市與農村呈現顯著的不均衡發展，特別是西部農村的發展水平與沿海地區存在巨大差異。從社會形態上看，大城市、沿海地區、西部農村幾乎涵蓋了從信息社會、工業社會到農業社會三大不同的發展階段，這意味着在嚴重的不均衡格局中，西部農村發展面臨着來自內部與外部的雙重困境。本文要探討的是互聯網在西部欠發達農村的兩種應用模式，其一是由台灣企業家、英業達集團副董事長溫世仁投資，在甘肅省貧困地區古浪縣黃羊川鎮興建的「網絡城鄉」。投資者認為，美國西部開發用了百年的歷史進程才得以成功，中國西部開發，只要引進互聯網技術，用該技術將黃羊川傳統農業社會與信息網絡對接，就可以成功地跨越工業化社會，進入信息社會（該理念及實踐被稱之

為「黃羊川模式」）。其二，在甘肅省酒泉市金塔縣政府與一些熱愛互聯網的精英的共同努力下，以「網絡連鄉村、信息進萬家」為目標實施的農村信息化建設工程。該工程解決了農民因不具備上網條件而無法獲得網絡信息的「最後一公里」問題。具體做法是由縣政府成立「金塔縣網絡信息服務中心」，該中心在其網站「中國金塔經濟信息網」發布《經濟信息導報》（中心人員根據互聯網及經貿、農業、科技、氣象等部門的各類農業和市場信息編輯而成）。縣政府在各村級小學設立信息點，配置計算機、速印機等設備，由學校教師或學生定期下載《經濟信息導報》，打印分發給學生，由學生放學後帶給其父母和鄰居。農民的回饋意見，逆序而行，由學校收集整理並通過電郵送回信息中心，信息中心據此對《導報》內容進行調整（該理念及其實踐被稱為「金塔模式」）。

由於中國城市、農村二元結構的對立，城市與農村呈現顯著的不均衡發展，特別是西部農村的發展水平與沿海地區存在巨大差異。從社會形態上看，大城市、沿海地區、西部農村幾乎涵蓋了從信息社會、工業社會到農業社會三大不同的發展階段，這意味着在嚴重的不均衡格局中，西部農村發展面臨着來自內部與外部的雙重困境。

* 論文寫作得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部分資助，在此表示作者深深的謝意。

如何利用傳播技術促進國家和社會發展成為傳播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中國發展傳播學研究是在二十世紀80年代之後、以廣泛的受眾調查起步的，主要內容是傳播與現代化觀念的調查。90年代中後期，一些以傳播學理論為框架對中國鄉村傳播現狀的研究開始出現，成為傳播學本土化的重要切入點。

初步調查顯示，「黃羊川模式」，除了對當地學生和部分村民提供了一定的網絡和計算機培訓外，對當地發展並無明顯改觀。經過培訓的村民使用計算機和網絡者寥寥，有人甚至用「網絡烏托邦」比喻「黃羊川模式」。相較之下，「金塔模式」對當地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是顯著的，據報導^①，截至2003年由於網絡介入為該縣直接帶來約兩億元人民幣的經濟效益。筆者認為經濟發展終將改變人們的文化觀念，促進社會進步。在本文中，筆者通過實地調查，闡述在欠發達地區社會發展中，傳播媒介如何與當地社會制度、經濟水平、文化環境相適應，傳播內容與當地社會需求相結合，共同促進社會發展。

二 文獻回顧

發展傳播學研究一個重要的肇始因素，是二戰結束後兩大陣營對立的政治需要。當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在二戰勝利後獲得了民族獨立與解放、具有了穩定發展的政治環境，而迫切要求發展本國社會經濟、促進現代化時，以社會學發展理論為核心的發展社會學研究，以西方現代化為範本，為其開具了國家發展的「藥方」，以期幫助這些國家盡快走上現代化之路。在此宏觀背景下，如何利用傳播技術促進國家和社會發展就成為傳播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以勒納 (Daniel Lerner)、施拉姆 (Wilbur Shcramm)、羅傑斯 (Everett M. Rogers) 為代表的發展傳播學研究，將大眾傳播媒介視為促進社會發展的「增效器」，賦予大眾傳播媒介在社會發展進程中巨大的作用^②。

二十世紀60年代傳播在社會發展中的功能、角色和方式基本上源於上述三位學者的構想。然而，要把這些構想付諸實施，還缺少理論的引導和技巧的提供，這就使得實際效果遠遠低於人們的預期。70年代初，經過反思、困惑和思索，新的發展典範逐漸浮出水面。總的來說，新的發展典範強調的是發展過程與特定社會結構的關係，並認為傳播媒介的動員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基層社會組織進行的。這一時期的研究多從典型個案着手，對抽象理論涉及不多^③。

80年代末，發展傳播項目主要強調了兩個內容，一是提高利益分配的質量，二是擴大民眾參與^④。對於學科的發展，則主要寄望於新的傳播技術，如衛星電視廣播和通訊，尤其是電視觀眾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大幅增加，使得研究電視在服務於發展目標中的作用可能有新的發現。至此，發展傳播研究已將其視野定位在發展中國家具體的社會狀況、傳播環境、媒介內容等層面上來，為該領域的深入研究積累了素材。

中國發展傳播學研究是在二十世紀80年代之後、以廣泛的受眾調查起步的，主要內容是傳播與現代化觀念的調查。當時，國內學者開始借鑑傳播學實證研究方法和現代化理論，對城鄉受眾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和分析^⑤。在研究方法上，這一時期的研究多採用採訪、抽樣調查和統計分析來探討國內受眾的媒介接觸行為與規律，屬於基礎層面的研究。90年代中後期，一些以傳播學理論為框架對中國鄉村傳播現狀的研究開始出現^⑥，一些以我國特定地區、民族為主要對象的傳播學研究也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⑦。這些傳播與現代化的研究豐富了我國

發展傳播學的內容，也成為傳播學本土化的重要切入點。

四 兩種「模式」的理念與實踐

三 分析框架和研究實施

國家權力與制度、地方政府、社會環境、社會組織和普通農民通過互聯網技術、傳播內容相互聯繫和作用，形成農村互聯網特有的傳播模式。其中，國家權力與制度為西部農村社會發展提供了宏觀背景，在此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的作為在很大程度上推動或抑制着農村社會發展；任何地區的發展進程都不能忽視其具體社會環境，包括自然地理狀況、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歷史積澱等，決定着網絡與農村對接的具體條件；學校是推動農村信息化發展的基層社會組織，起着提高農民教育水平、向農民傳播新技術的橋樑作用；推動農村信息化發展必須與農民需求相結合，農民是新技術傳播的最終歸宿，也是普及和應用新技術的最終對象。上述因素共同影響農民對傳播技術的接納和採用，並最終決定農村的社會發展水平。

本研究主要採用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包括：

1. 在黃羊川鎮和金塔縣共進行入戶問卷調查600戶／人，回收有效問卷587份，回收率為97.8%^⑧。

2. 根據非參與性觀察的現象，對所取得的數據進行一定的核實和驗證。

3. 對各縣、鄉一級政府部門的主要領導、學校領導、學生和農民等四十一人^⑨進行了訪談。

4. 對網絡版《經濟信息導報》進行內容分析。

「黃羊川模式」的投資人溫世仁認為，信息網絡時代的來臨，使財富的定義和創造財富的方法發生了全局性的變化。由於西部農村從一開始就沒有來得及搭上「工業化的列車」，農民普遍缺乏創造財富的能力。然而，數字科技能夠為經濟發展帶來希望和生機，「數字科技的可怕性，在於它促使並帶動知識型經濟的快速發展。……一個農業社會超越工業化的過程，直接進入資訊網絡社會，其實是可能的」^⑩。這是因為，「通信的光纜幹線比鐵路便宜，軟件開發中心比硬件生產線便宜。……『超越工業化』不僅理論上可行，事實上已有一個成功的案例，證明其可行性是毋須置疑的」^⑪。溫世仁的這一理念，與未來學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博士的預言不謀而合，或者說，是受了他的影響。托夫勒認為，正是因為成熟的現代信息網絡通信科技和其效果的經濟性，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地區，超越工業化的演變過程，直接進入信息網絡社會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與之相應，英業達集團設想在黃羊川建立「網絡城鄉」作為軟件開發中心，它不僅提供相關的商務服務，同時也是信息網絡時代的「生態示範區」：除引用現代化社會習以為常的設施外，更示範最新的電子商務、遠程聘用及有質量的生活方式，讓數字化從網絡城鄉中心擴散到方圓五平方公里——未來網絡城鄉的所在地。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投資者已經在黃羊川投資建造了五星級酒店標準的「黃羊川國際會議中心」(以下簡稱「中心」)，並為黃羊川職業中學提供了上

「黃羊川模式」的投資人溫世仁認為，西部農村從一開始就沒有來得及搭上「工業化的列車」，但數字科技能夠為經濟發展帶來希望和生機。「超越工業化」不僅理論上可行，也有一個成功的案例。從「黃羊川模式」投資者構築的藍圖中可以看到，網絡技術將作為促進農業社會到信息社會的關鍵，是社會形態變遷的動力，以此培訓農民逐步成為信息產業工人，實現「離土不離鄉」的身份轉變。

英業達集團設想在黃羊川建立「網絡城鄉」作為軟件開發中心。集團投資建造國際會議中心，並為黃羊川職業中學提供上百台計算機。圖為黃羊川職業中學的電腦機房。



百台計算機。中心能提供150人開會的視頻會議室和全套設備服務，而黃羊川職業中學則是培養「網絡城鄉」軟件園區技術工人的基地。網絡城鄉中心的商業模式以舉辦國際會議為主（探討消除「數字鴻溝」和解決貧窮差距等議題），中心附近的鄉村正是提供相應案例最適合的場所。前來開會的國際人士，將會帶來不同的觀念、生活習慣、知識技巧和金錢。為了擁有商機，村民首先提供最原始的勞力、自然資源、風土人情。久而久之，為了賺取更多外來人的錢，村民們也得接受新的價值觀和社會習俗，從網絡城鄉學習「數字」技能。隨着各種國際會議的召開，更多的「數字」項目將在四周活動起來，不知不覺周圍的景觀就會改變：雖然幾公里外還是農業社會，但在中心方圓五平方公里的區域內，已經轉變成現代化的信息網絡社會。中心將創造可觀的就業機會，吸引住在偏遠地的鄉民往國際會

議中心附近遷移。接着，中心附近就會形成一個人口密集、經濟發達的小區。在此工作並立足的鄉民，也能把在「自然村」的家搬來。那些已經無法養家糊口的耕地得以「退耕還林」。通過更多的交流和發展，將會帶動更多人往中心小區搬遷，刺激服務業的發展，自然環境也會得到適當保護。從散居到聚居的轉型過程中，農業社會可以直接邁進信息網絡社會，不須要經過工業社會的過渡，因此也不會帶來社會問題和環境的破壞。

從以上投資者構築的藍圖中可以看到，網絡技術將作為促進農業社會到信息社會的關鍵，是社會形態變遷的動力，以此培訓農民逐步成為信息產業工人，實現「離土不離鄉」的身份轉變。

「金塔模式」是在當地政府主導下、以低成本運行方式實施的一種網絡應用模式。在網絡建設方面，「金塔模式」巧妙利用「虛擬主機」，租用蘭州市電信局服務器建立網站，既節省了資金，又彌補了技術上的不足，更解決了設備更新改造經費之虞。依託各村小學作為信息點，其基本配置的經費由政府財政投入，每個信息點一次性投入約一萬元人民幣，其他經常性費用如蠟紙、油墨、紙張、上網費等，各信息點每年大約六百元。農民獲得的報紙是免費的。在信息傳遞發布方面，信息下載和回饋均由學校教師和學生完成，由小學生利用放學時間順路帶給父母或鄰居，不須配備專職信息員，節省了人員工資和傳遞費用^②。低成本運行方式符合欠發達農村的實際情況，成為解決「最後一公里」的有效方式。

「金塔模式」的創始者沈俊濤原在甘肅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工作，2000年任

金塔縣政府副縣長期間，感受到當地農民在農業信息匱乏狀態下飽受種植與銷售脫節之苦，在為農民解決信息傳播管道和發展農業信息化過程中，他認識到^⑩：

地理和經濟條件的限制以及歷史上計劃經濟行政指令式的長期控制，農民在技術、市場信息的獲得上缺乏必要的 ability、管道和手段，尤其是政府部門擁有的大量信息農民無緣共享。而作為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民，他們對產業結構調整的態度是至關重要的。把政府與農民通過一定的方式緊密地聯繫起來，充分地溝通，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把政府的決策分散到了千家萬戶，避免了長官意志造成的風險，完全符合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

沈俊濤對農業生產特點的清晰認識、對農村產業結構調整需要農民支持的把握，以及對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的深刻理解，使得他創造性地提出了解決信息入戶「最後一公里」的設想並付諸實施。在實施中，沈氏將農業信息服務網絡建設作為開端，走訪180多戶農民家庭，了解他們對農業信息服務的意見和要求，向農民進行農業信息化的宣傳。通過對紅光村等四個村的試點，到2001年下半年，在基層領導的支持下，農業信息服務網絡開始在金塔逐步推廣。

五 兩種「模式」的效果分析

兩種互聯網的應用模式，導致了明顯不同的社會效果。「黃羊川模式」除了在黃羊川職中引進計算機和網絡

教育、培訓外，在當地社會並未獲致投資者預期的效果。投巨資興建的「國際會議中心」目前尚未舉行任何主題的研討會，商業運營未見成效。期望與效果之間的差距可能來自多方面的影響。

首先，當地政府缺乏創新意識，更缺乏組織動員當地社會積極利用這一契機，推動當地經濟發展的意識，致使這一創新的推廣缺少制度化的保障。

網絡引進黃羊川伊始，投資方未與當地政府接洽商議，而是直接與黃羊川職中商討引進計算機。直到「國際會議中心」興建計劃提出後，政府出面協調收購農民五十畝耕地作為用地，並在水電、交通、敷設寬帶光纖等方面提供了最大的幫助(89.4%的用戶使用政府敷設的ISDL)。但政府的介入僅限於此，從觀念上他們更寄希望於投資方能夠在產生直接效益的項目(如土豆加工)上提供幫助。另外，投資者的台商身份讓他們更持觀望態度，更沒有將其看作振興黃羊川發展的契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網絡的普及。

其次，黃羊川的生存環境十分惡劣，其所屬的古浪縣是甘肅省十八個乾旱縣、四十三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之一。2003年全縣生產總值92,012萬元人民幣，其中農業生產總值佔35.13%。人口39.81萬，農業人口37.52萬^⑪。位於縣東北部的黃羊川鄉是中國西部最貧窮的鄉之一，乾旱貧瘠導致其低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貧困落後的現狀。儘管經歷了80年代農村責任制的改革，經濟有了很大發展。但是惡劣的自然環境使得黃羊川只能維持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2003年，黃羊川人均純收入1,350元。在英業達

當地政府缺乏創新意識，更缺乏組織動員當地社會積極利用網絡引進黃羊川這一契機，推動當地經濟發展的意識，致使這一創新的推廣缺少制度化的保障。政府從觀念上更寄希望於投資方能夠在產生直接效益的項目(如土豆加工)上提供幫助。投資者的台商身份令他們更持觀望態度，更沒有將其看作振興黃羊川發展的契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網絡的普及。

互聯網在黃羊川職中的運行模式是獨特的。考慮到網絡的安全問題和學生思想教育的現狀，學校局域網對互聯網的內容進行了預先處理。由於這種「預處理」，學生在經過一定的互聯網操作後仍不知道國內幾大商業門戶網站，不知道新浪、搜狐、雅虎和網易的分別為50.6%、40.4%、71.9%和79.8%。只有33.7%使用過搜索引擎，86.2%的人沒有電子郵箱。

進駐之前，當地農民僅僅依靠電視和外出打工人員獲取外部世界的信息。而由於經濟條件的限制，國家實施的「村村通」工程在這裏並無明顯作用，農民普遍自己安裝地面衛星天線接收境外頻道，由於語言不通，他們只能通過畫面看一些熱鬧。

再次，「黃羊川模式」對當地經濟的推動作用，僅反映在「校園網吧」實施的「電子商務」上。「電子商務」的主要業務就是幫助有需求的農民在網上出售種植的土豆、大蒜等農作物，並適當收取信息費。據「校園網吧」統計，自2002年開始第一次在網上完成農作物交易（將當地產的芹菜賣到銀川），到2003年共完成網上銷售額五十二萬多元。顯然，此「電子商務」是一種被動型的校園服務的方式，市場需求遠未發育成熟。

除了在進入黃羊川路口處赫然樹立着「中國黃羊川網絡經濟長廊」（2005年再次追蹤調查時，發現牌子上的內容已經更改成行政宣傳標語）的標牌外，我們並未在當地觀察到更多的網絡經濟的跡象。當我們對此表示疑義時，黃羊川職中的負責「校園網吧」的教師胡萬龍認為，網絡對當地農業最大的推動作用在於，經過互聯網的促銷，一部分農民已經將傳統種植的土豆、小麥改為經濟作物（如蒜苗），後者可以為農民帶來比前者高出二到三倍的效益。但調查得知種植經濟作物需要大量的水利灌溉，對於缺水現象十分嚴重的黃羊川而言，無疑捉襟見肘。由於缺水，許多鄉民每天要步行二十公里去取水。許多農戶家庭仍喝着積聚的雨水或雪水。數據顯示，黃羊川水地面積佔所有耕地面積的9.2%。顯然，絕大部分分布在山區的農田是與經濟作物無緣的。通

過經濟作物帶動黃羊川農業的增收可能只是理論上的設想。

自從黃羊川職中網站（www.yellowsheepriver.com）運行以來，前來參觀考察的人數多了起來，黃羊川鎮也有了少數的餐飲和交通服務，但規模小、檔次低，而且遠沒有帶動當地服務業大幅增長。最大受益者是為修建國際會議中心投入勞動力的村民，這一工程為當地農民提供了近一百多萬元的就業收入^⑨。

第四，學校教育是一個比較恆定地對人們的社會地位起干預作用的變量。儘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它的作用幅度有所變化，但教育程度高低決定人們社會地位的推斷，卻始終成立^⑩。「黃羊川模式」走的是「以校領鄉」的路子，由於網絡的介入，黃羊川職中成為遠近聞名的學校，生源、就學率有了很大提高，輟學率比任何時候都低^⑪。當部分優秀師生在英業達集團支持下走出黃羊川到北京、天津參觀學習，當一批批支教的大學生和海外民間團體來到黃羊川職中講學交流，這些信息的互動對學生觀念的震動是巨大的，這些信息裹挾着現代社會的觀念、生活方式以及競爭意識襲來，讓學生直接感受到了現代社會的衝擊和激蕩，對他們學習、實現自己理想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調查顯示，不僅學生，甚至他們的家長都對學生未來的出路抱有一份希冀：走出大山，學習本領，報效家鄉。面對問卷中一排排寄託着美好理想的筆迹，筆者不禁惆悵：不知這些能夠走出大山的孩子又有多少能夠回到貧瘠的故鄉呢？這顯然不是一人一縣所能解決的問題。

互聯網在黃羊川職中的運行模式是獨特的，由英業達集團提供的軟件

支撐着學校局域網，其中，學習軟件、課件十分豐富。考慮到網絡的安全問題和學生思想教育的現狀，學校局域網對互聯網的內容進行了預先處理，將一些新聞網站(如CCTV網站)和有關學習的內容下載到局域網的服務器中，學生直接從服務器中查詢相關內容。即職中的學生接觸的「互聯網」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InterNet。對於這項措施，學校解釋是為了學生思想的純潔。學生也認同這一做法。當我們問及如果登陸了不健康的網站將如何處理時，學生異口同聲地答到：「我們不看！」

由於這種「預處理」，學生在經過一定的互聯網操作後仍不知道國內幾大商業門戶網站，不知道新浪、搜狐、雅虎和網易的分別為50.6%、40.4%、71.9%和79.8%。同時，使用過搜索引擎的有33.7%，知道「Google」、「百度」、「3721」、「中國搜索」等分別為4.5%、10.1%、7.9%、25.8%。在這種方式下，學生很難為自己註冊電子郵箱(86.2%的人沒有電子郵箱)。有些學生使用教師的電子郵箱與外地朋友(大部分是英業達集團的員工)聯繫，大部分人(85.7%)每周使用電子郵箱不到三次。互聯網並未充當起信息溝通的角色，尤其是其雙向傳播的特徵在這裏已經變成單向的傳播管道。除了提供學習數據和部分國內外新聞外，互聯網其他的功能已被完全遮蔽。不知這種近似因噎廢食的舉措是否真的可以將不健康的內容拒之「網」外，或者真正幫助學生獲取信息、了解周圍的世界？

黃羊川農民接觸的大眾傳播信息較之金塔更為單一和稀少，兩地在接觸報紙媒體方面具有明顯的差異(金塔日均讀報時間為22.56分鐘，黃羊川則

只有1.83分鐘)，報紙信息的傳播強度明顯不同。

我們從對兩地農民電視態度的方差齊性檢驗得知，金塔農民並不是完全通過電視獲知外界的事情，經濟的活躍、市場信息的開放都是他們信息交流的管道。因此，電視並不是為他們提供全部信息的唯一渠道，比如讀報，他們對廣告的接受程度相對要高。總體來看，金塔傳播系統更為多樣和立體。由於小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電視中的生活與自己的生活相比並無天壤之別。因此，消費需求和廣告就成為引導他們的最好信源。相較之下，除了打工者回鄉帶回的零星信息外，電視便是黃羊川張望世界的唯一窗戶，他們對電視的依賴程度要高於金塔。

在接觸電視時間大致相同的情形下，不同社會環境的群體對電視所傳播的信息的接受和理解是不完全相同的，經濟更加落後和貧困地區的農民，其信息的閉塞使他們對電視的依賴程度較高。一個嚴峻的現實是，電視裏反映農民生活的節目信息太少，以致於成為這些地區影響農民收看電視的主要因素之一。

比較而言，「金塔模式」對當地經濟的促進作用是比較明顯的。金塔是以種植為主的農業縣，全縣13.8萬人口中，農業人口為11.2萬，耕地面積43萬畝。200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4,260元，高出同年黃羊川1,588元。由於日照充足等自然條件，該縣盛產油料、棉花、瓜果等九十多種農產品。棉花是該縣的重要經濟作物，居於農業結構中的重要地位。2004年，全縣棉花總產量9,483萬斤，農民來自棉花的人均收入可達到4,000元^⑧。據「中國金塔信息網」報導，到2003年為止^⑨：

黃羊川農民接觸的大眾傳播信息較之金塔農民更為單一和稀少。通過對兩地農民電視態度的檢驗發現，金塔農民並不是完全通過電視獲知外界的事情，經濟的活躍、市場信息的開放都是他們信息交流的管道。相較之下，除了打工者回鄉帶回的零星信息外，電視是黃羊川看世界的唯一窗戶，他們對電視的依賴程度高於金塔。

「金塔模式」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當地政府的積極參與與推介。其次，農業新技術推廣過程中，一些熱衷網絡技術並具有行政領導力的個人的作用不可小覷。再次，農業信息符合當地社會需求，與農民生產生活息息相關。最後，通暢傳播與回饋管道，使信息發布者及時獲知農民的需求，傳送他們最急欲獲得的信息，提高了信息傳播的價值和效果。

全縣各信息點先後從國際電子商務網站搜集下載各類信息十五萬條，網上發布招商信息九百條，產銷信息1.8萬條，提供各類農業信息近十萬條，網上簽訂農業訂單五十七個，輻射農戶簽訂購銷合同五萬份，為全縣能人、協會和流通大戶提供發布信息牽線搭橋，使全縣棉花、孜然、黑瓜子、早酥梨等十多類農副產品、礦產品在網上找到了銷路，銷售金額達3.2億元。……全縣已基本形成了集電子商務、產銷信息發布為一體的信息服務網絡，為促進全縣社會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另外，當地政府在信息化發展中具有創新意識，將信息化發展納入其制度化管理之中，逐步轉變政府管理職能，將服務當地農業生產作為政府主要職能，並在此基礎上推進電子政務進程。

如果說「金塔模式」是農村信息化進程中較為成功的模式的話，那麼，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當地政府的積極參與與推介。地方政府對農業信息化發展能夠推動農村經濟發展有着比較清晰的認識，使得在沈俊濤創造性地提出農村信息化發展模式時，當地政府積極推動網絡公共服務的發展，並將其納入到政府行政權力結構之中，在制度上保證了這一發展模式的普及和廣泛應用。

其次，在推廣農業新技術的過程中，一些熱衷網絡技術並具有行政領導力的個人的作用不可小覷。其作用在於搶佔先機地掌握了最新技術，成為新技術推廣過程中的領軍人物。而由於這些精英人物的地緣性，他們在積極推行這一新技術中所具有的天然

親和力，加快了普通人群接受新技術的速度。但是，這種新技術一定是與當地經濟發展相適合的，所傳播的信息又是普通人群所需要的。「金塔模式」實踐，與其創始者沈俊濤等人的努力分不開。有一點不能忽視的，即沈氏在創新地提出這一模式並身體力行的過程中，他個人所具有的身份（副縣長）影響，如果設想沈氏是一個具有良好教育背景、掌握並酷愛網絡技術的普通人，在他提出「金塔模式」之後，能否將其推廣普及到廣大農民中？筆者不敢肯定，至少，在時間上還需要更長的等待。比較而言，溫世仁也同樣是新技術的引領者和實踐者，但由於當地政府的缺位，致使網絡技術並未產生應有的作用。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在欠發達地區社會發展中，地方政府所具有的巨大作用和影響。

再次，農業信息傳播必須符合當地社會需求，與農民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為誰傳播的問題是農業信息化過程中首要解決的問題。我們分析過發布至今共九十五期《經濟信息導報》的主要標題，發現農業實用技術、農業市場分析與預測、良種推介、農業氣象預報、農業生產等信息是其主要內容。《經濟信息導報》以農業實用技術為主要傳播信息，向農民介紹種植、養殖、防止病蟲害、預防家畜家禽疾病等知識。在農業實用技術中，養殖、種植及其疾病的預防和治療構成《經濟信息導報》的主要內容。有了大量與當地農時、氣候、特有農產品市場走勢、供求信息、農作物種植、家畜飼養密切聯繫的信息內容，才能被農民所接受，也才能真正成為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引擎」。假以時日，隨着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信息溝通的

通暢，其文化觀念和行為方式的變革是可期待的。

最後，通暢傳播與回饋管道，使信息發布者及時獲知農民的需求，傳送他們最急欲獲得的信息，提高了信息傳播的使用價值和傳播效果。

六 結 論

通過兩種網絡應用模式的比較研究，可以看出：

第一，在我國「後發—外生」型的現代化進程中，強有力的政府主導作用不可或缺。西部農村信息化發展既需要國家的資金扶持和政策傾斜，也需要地方政府的全面介入。創新意識是政府推動農村信息化發展的首要條件。

第二，欠發達地區農村傳播體系主要由電視傳播和人際傳播構成。傳統大眾傳播媒體在西部農村的現狀不盡如人意：電視媒體在傳播農村農業信息方面與農民的信息需求之間有一定差距，報紙媒體的傳播範圍狹小，這些都對農村信息化全面、立體、多途徑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制約作用；同時也不利於包括互聯網在內的新技術、新觀念的擴散和普及。

第三，欠發達農村經濟落後、農民受教育程度低下是影響其社會發展的制約因素之一，知識匱乏、文化貧困進一步遏制了對技術的學習與採納，影響了經濟的增長與繁榮。經濟衰蔽與凋零又進一步束縛了農民受教育的動機和需求，惡性循環的結果，使西部落後農村和農民被甩在現代化進程的高速列車之後，成為被邊緣化的弱勢群體。在(由信息化)促進西部

農村經濟發展的同時，改善農民受教育環境，提高農民學習、吸收新知識的能力和技巧，促使他們分享人類社會進步的最新成果，是農村社會發展中不可忽視的要件。

第四，互聯網技術在推動農村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並非唯一的決定因素。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有着複雜的互動關係，只有與特定社會環境的諸多複雜因素相協調，網絡技術才能與之形成合力，有效推動當地社會發展。因此，認為把網絡技術引進傳統農村社會，便能引起該社會超越工業社會、進入信息社會的發展觀念，不是陷入「數字烏托邦」的幻想，就是落入「技術決定論」的窠臼。

第五，建構適合的傳播內容。為誰傳播和傳播甚麼的問題，是農村信息化進程中必須正視的，結合了農民實際生產、生活需求的網絡傳播內容，才能轉化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助力。農業信息化網絡傳播過程的主要受眾是基層農民，引導、滿足受眾的信息需求是傳播媒介得以發揮影響的前提。同時，建立暢通的受眾回饋路徑，能夠更好地了解受眾的需要，制訂適合的傳播策略，形成信息的雙向溝通。從兩方面看，缺少受眾一端的傳播過程顯然是不完整和不能進行的。

第六，「金塔模式」構建了一個完整的雙向傳播的管道，即，網絡信息服務中心→村級信息點→《經濟信息導報》→農民以及農民需求→村級信息點→網絡信息服務中心，這種互聯網傳播模式和低成本運營的互聯網應用和推廣模式，是符合西部農村特殊的發展情況的，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和推廣價值。

互聯網技術並非推動農村社會發展的唯一決定因素。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有着複雜的互動關係，只有與特定社會環境的諸多複雜因素相協調，網絡技術才能與之形成合力，有效推動當地社會發展。因此，認為把網絡技術引進傳統農村社會，便能引起該社會超越工業化、進入信息社會的觀念，是落入了「技術決定論」的窠臼。

註釋

①⑩ 〈金塔縣信息網絡工程建設簡介〉，「金塔縣經濟信息網」(www.jtxnet.com/XXDB/xxwl-2004-9.htm)。

② 勒納認為媒介是流動的增強者(mobility multiplier)，一個社會具備了從口頭傳播向大眾傳播的機制和契機，隨之而來的就是社會變遷。他從個人心理角度提出「移情」的概念，並認為這種能力的具備是從傳統人到現代人必不可少的。施拉姆詳細分析了大眾傳播媒介在促進國家和社會發展中的具體作用，把媒介看作是發展的推動者(mover)。羅傑斯秉承了勒納和施拉姆的發展的經濟導向的觀點，認為通過更多現代生產方式以及改進社會組織，可產生高度的國民平均所得，以及高水平的生活。

③ 陳世敏：《大眾傳播與社會變遷》(台北：三民書局，1983)，頁25。

④ 羅傑斯在美國夏威夷東方中心召開的關於傳播與文化變遷討論會(1987年7月20日至8月1日)上的發言，劉燕南摘譯：〈傳播事業與國家發展研究現狀〉，《國際新聞界》(北京)，1988年第4期，頁20-23。

⑤ 如1987年由中宣部、廣電部及國家農調總隊實施的、歷時一年的「中國不發達地區農村廣播電視受眾」調查；1983年祝建華等人對上海郊區農村進行的傳播網絡調查；1985年張學洪等人對江蘇的蘇南、蘇北、蘇中等地農村進行的受眾調查，1988年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舉行的全國農村聽眾調查等。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很有價值的有關傳播與人的現代化觀念研究的調查，如王怡紅的《大眾媒介對觀念現代化的影響》，閔大洪等人的《浙江省城鄉受眾接觸新聞媒介行為與現代觀念的相關性研究》等。陳崇山、孫五三主持完成的以傳播與人的現代化為對象的研究等等。

⑥ 較有代表性的是裘正義的博士論文：〈大眾媒介與中國鄉村發展〉(上海：復旦大學，1993年博士論文)。

⑦ 例如張宇丹《傳播與民族發展》、方曉紅的《蘇南農村大眾媒介與政

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互動關係研究》、仇學英對貴州、雲南、廣西等貧困山區進行的「大眾媒介傳播和農民政治參與的研究」等等，都是這一領域的成果。還有一些專題研究，如卜衛《大眾媒介對兒童的影響》、《媒介與性別》等都涉及到了傳播與人的觀念現代化關係。

⑧ 其中，黃羊川調查三百份，考慮到黃羊川部分村民和學生受過計算機和網絡技術培訓，故我們在問卷設計時，分別針對經過培訓的人員(我們稱之為「網民」，也許他們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網民)和普通農民設計了A、B兩種不同的問卷，B問卷是針對經過培訓的人員(包括黃羊川職中的學生)。

⑨ 有些訪談是群訪性質的，如對黃羊川職中的教師、學生的深訪，這種深訪形式只算為1人/次。

⑩⑪ 溫世仁、林光信：《告別貧窮——八億農民的出路》(北京：三聯書店，2003)，頁19-20；21。

⑫⑬ 沈俊濤：《最後一公里——經濟欠發達地區建設農業信息服務網絡實用指南》(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頁60-61；3-4。

⑭ 「古浪農業信息網」(www.gulang.gansu.cn)。

⑮ 黃羊川鎮政府訪談資料。

⑯ 轉引自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197。

⑰ 訪談黃羊川職中教務主任張斌武的談話內容。

⑱ 牛元：〈棉花羊肉產業帶頭，金塔農村經濟快速增長〉，「新華網甘肅頻道」(www.jinta.gansu.ouol.com/)。

王錫苓 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副教授

李惠民 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段京肅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